

# 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

卓新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5 Jianguomennei Street, Beijing, China

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的關係、其對基督教的態度，是目前大陸學術界頗為關心的問題，也是海外基督教界很感興趣的，且愈亦關注的。文化積澱和人格精神上的特點，使中國知識分子對其他傳統的事物多持懷疑和保守的態度，一般不會輕易接受，更難於將之融入文化精神之中。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那些經過深思熟慮而認准接受的事物，也往往會表現一種執著、持守、鍥而不捨的態度，顯示其無忌、無悔之豁達與成熟。中國知識分子是否接受外來的思想文化乃基於：一、對民族、國家及文化精神之大局發展的考慮，這與他們關注國、民命運的「憂患意識」相聯繫；二、對新文化精神的承載者或傳播者之人格特點聯繫，即所謂「觀其言，察其行」。在此，宣道者個人的人格至關重要，這會對觀察、研究他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往往「寬容弱者，苛求強者」，中國人對那些在社會群體或文化發展上的領袖人物有著獨特的要求，就是他們必須首先隨時為理想和追求犧牲。

基於上述兩項因素，下文將對基督教在華發展的曲折過程和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複雜態度作基本的梳理，從而探討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研究和態度。

---

\*本文乃卓新平教授於1996年10月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之中國文化之友季會上發表的文章。

## 一、中國大陸學術界的基督教研究現狀

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宗教研究愈亦活躍，基督教研究也逐漸深入，尤其在過去的五、六年間，學術界的基督教研究達到高潮。除了基督教界各新教、天主教神學院或學術機構的研究逐漸走向正規、系統化之外，不屬於宗教界的各社科院、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基督教研究也頗具規模，對中國社會有著更為廣遠的影響。值得一提的研究機構和中心，相關的研究方向、特色可簡述如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其研究歷史最長，研究成果亦頗多。涉及基督教研究的包括基督教研究室、宗教學原理研究室、當代宗教研究室、〈世界宗教研究〉及〈世界宗教文化〉編輯部。研究人員包括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最早開始專門從事基督教研究的碩士畢業生，畢業於哲學、歷史、外語等專業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研究範圍包括基督教神學、哲學理論、《聖經》等經典文獻，基督教會的歷史與現狀，中國基督教歷史發展及其本色化等。此外，還參與全國社科基金項目中基督教研究的規劃和對全國基督教研究狀況的總結、評估。為了深化、擴大對基督教的系統研究，研究所正著手籌建一間具民間性質的基督教研究中心，專責聯絡社科院內外人文知識分子作共同合作研究。中國社科院其他涉及基督教研究的單位還包括：哲學所的經院（士林）哲學和新托馬斯主義研究；世界歷史所對入華天主教傳教士的研究；歷史所對明清以來基督教來華傳教史的研究等。

其他各省市的社科院系統中，以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當代基督教研究較為突出，最近他們又開始了對天主教哲學和社會學說的探討。其他研究機構的基督教研究包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對進藏傳教士的研究；中國明史研究會利瑪竇研究分會對明代入華耶穌會士的研究。

從大學系統來看，北京大學最近成立了宗教系，開展中世紀基督教哲學和當代神學理論的探究；人民大學中文、哲學兩系的學者從事基督教神祕主義的研究和基督教與文學之比較；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正著手研究俄羅斯正教；北京師範大學也曾探討近代教會在華的高等教育。上海高校的基督教研究以復旦大學和上海教育學院為主。復旦大學哲學系的

基督教哲學研究，歷史系的中國近代基督教發展研究，以及美國研究中心對北美基督教和中國教會大學的研究都有一定影響；上海教育學院則成立了宗教研究中心，突出中國基督教史，尤其是天主教在華歷史的研究。南京大學的基督教研究與金陵協和神學院有直接聯繫。福建師大歷史系的中國教會史研究獨樹一幟、頗有影響。杭州大學哲學系建立的基督教研究中心，以研究中國基督教史、基督教思想與古希臘哲學的關係為主。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則建立了教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此外，河南大學、山西大學、深圳大學、湖南師範大學、湘潭大學、南開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廣州師範學院、哈爾濱師範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等也不同程度地開展了基督教研究。

這些研究機構和大學知識分子研究基督教的興趣和原因頗為多樣和複雜，許多問題尚需要深入觀察和研究，才能得出基本結論。大體來看，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

其一，基督教研究乃出自對人類文明史、世界文化史研究的興趣和需要。大陸學術界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多領域的研究中，比較注重系統化、全面的歷史研究。因此，當研究世界史、中國史、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等領域時，便不可避免地會碰到基督教的理論或知識問題，從而激發了對基督教的學術興趣。目前大陸的基督教研究既能為宏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鋪墊基礎，而在這個過程中又能深入本身的研究。中國大陸學術界的知識結構和體制建構，使基督教研究水到渠成，並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大陸學術界對基督教的研究早在五十年代就已開始，在六十年代也曾有一些研究成果問世，但七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在學術界全面展開的基督教研究，則不能簡單以學術發展之歷史慣性來解釋，而是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因素。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模式和框架，雖為當代全面展開的基督教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土壤，但其興盛卻離不開文革結束後大陸出現的改革開放，走出封閉的新形勢、新機遇。

其二，基督教研究乃出自對西方思想精神的關注和重視。自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國家對立，故在學術觀

點上對西方思想精神持有明顯的批評態度和抵制立場。儘管大陸學術界充分肯定和積極研究西方學術思想發展史上的唯物主義傳統，尤其是近代人文主義理性思潮、啟蒙運動、人本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但對這個傳統以外的其他西方思潮則批評較多，肯定較少；即使在肯定中，亦有不少保留意見和尖銳批評。至於西方宗教精神，尤其是基督教精神，學者僅在宗教改革運動上有某些肯定之見，餘下則為批評和否定。這種狀況固然與中國知識界重哲學、輕宗教，褒哲學、貶宗教之傳統偏見相關；但更重要的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基督教對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基督教與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勢力相關聯而給中國人「洋教」的形象。這問題是中國知識界和基督教思想界都值得深思和反省的典型案列，因為它直接影響雙方的溝通、理解和求同存異。筆者認為，今天面臨的現實既與過去積澱已深的誤解相關，又反映出雙方在歷史認知和實踐上的種種不足和遺憾。

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中國知識界有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迫切要求。中西雙方的政治、外交解凍，經濟、文化交往增多，以及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的重構，為中國知識界提供了重新評價西方思想精神及其與西方社會政治發展的空間，而且在現實上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對西方思想精神的尋根溯源和古今比較，都離不開研究和理解基督教。誠然，基督教誕生於中東地區，其普世意義也應超越西方之限；但對大多數中國學者而言，基督教能成為今天這種形態和規模，實跟其參與、構成西方文明的歷史息息相關，而且其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亦有著鮮明的西方文化烙印。因此，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基督教研究就不再局限於上述的學術建設和知識層面，而成為比較中西文化異同、重構中國思想精神、為中西文化在世界當代發展中定位的使命。

其三，基督教研究乃出自中國學者的需要：他們重新觀察、認識、評價基督教在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的作用、意義和影響，目的是以此作為重建中國文化的其中一項資源。中國大陸學術界必須承認，過去的基督教評論深受中國的政治現實和中西意識形態抗衡的影響，很難客觀或超脫的展開研究和評說。這種現實影響及學術研究的束縛今天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整個形勢已大為改觀：學術研究的良好氣氛，如民主自

由、獨立思考和分析評說等正與日俱增，大陸社會各界，無論從民間到官方，因而都感到有需要對宗教，尤其是在華命運多蹇的基督教重新認識和評價。把宗教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將之放在整個人類文化體系中來認知，正是當代研究擺脫傳統束縛、持有客觀態度的切入點。儘管大陸各界對宗教文化論迄今仍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但這種理論所創造出來的寬鬆學術氛圍對打破宗教認識上的僵局、衝破禁區，實有著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然而，基督教研究剛剛開始，人們對基督教的歷史與現狀，尤其是在中國的基督教，既有肯定，也有批評，遠未達到一種共識。筆者認為這種共識不只是歷史的回顧，而是現實的努力。凡關心中國文化命運，希望中國發展富強的人，都應為達到這共識而努力，付出其辛勞和睿智。

其四，基督教研究乃來自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個人的靈性需要或尋真之探。知識分子的良心、人格、道德風範、氣質、修養，既是中國知識界的傳統話題，又是當今社會轉型時，知識分子如何在商業化、功利化、實用主義風靡的現實社會中，表現其「憂國憂民」、「潔身自好」的現實任務。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形象應與知識、人格共同進步，一個學者應有淵博的文化知識，也應有感人的人格魅力。在思想精神混亂、道德人格水準下降的社會處境中，知識分子總想走出迷茫，尋找本真，最終勢必會上下求索，以達超越。因此，對基督教精神及本真的關切和探究，遂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重要內容。大概而論，這種研究的走向和結局會呈多元之態：有的質疑或挑戰基督教作為一種信仰精神和人之實際存在之間出現的問題；有的開始體認基督教信仰卻超脫其教派之限，所謂的「文化基督徒」即是一例；有的以皈依之舉而在基督教「個人得救」中找到歸宿；有的因傳教意義之單向「引入」和「獨白」而感覺到潛在的隔膜和誤解；有的則作為基督教的真誠朋友，以旁觀、超脫之態對基督教加以評說、與之展開對話，並對之抱著更高的期望。由此可見，中國知識分子的基督教研究與其對基督教的基本態度有著密切的聯繫。

其五，基督教研究亦來自一些學術機構或個人在學術生存、發展上的需求。大陸學術界近年出現一種現象，就是除了原本專職從事基督教

研究的學者之外，愈來愈多的人文學者從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轉向研究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研究。這種現象開拓了基督教研究的新視野、新領域，並帶來了研究的新方法、新見解，是頗值得歡迎和高興的。但若深入剖析此現象之緣由，則不得不承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陸人文學科所出現的危機。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如魚得水，大有用武之地，從而得到多方面的青睞，迅猛地發展；相比之下，人文學科則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和獨尊，在知識不能「換錢」的處境下步履維艱。儘管文、史、哲按其學科發展仍有值得開拓和深入的領域，然其本有規模已經過大，甚至供過於求，加之人們興趣轉移，所以已顯出學科發展的某些危機。如大陸學術界在談論的所謂「哲學的貧困」、「歷史的遺忘」和「文學的冷落」，乃是這種處境的生動寫照。宗教研究作為一門人文學科，雖有著同樣的問題及獨有的「敏感性」，但由於這門在大陸真正全面展開的研究畢竟只有十年左右的時間，因而研究的領域和空白比文、史、哲等學科顯得更多更廣。況且，這種宗教研究也還存有與宗教界合作或得到宗教界支持的可能性，從而給文、史、哲學者帶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不過，值得考慮的是，基於這種需求而出現的宗教研究熱能否持久？會出現哪些意想不到的後果？會走向有序，還是導致嬗變？答案當然只能在未來找尋。

以上從五方面簡略介紹了中國大陸學術界基督教研究的基本情況，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開展這研究的原因或興趣之所在。上述五個層面有些是相交織的，很難明確歸類或區分；然而，它提供了當代中國大陸學術界基督教研究多元而豐富的圖景。

## 二、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基本態度

中國知識分子在認識、接受或抵制外來思想文化上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基督教入華傳教的幾次經歷、成功與失敗，除了受政治大氣候影響之外，亦與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態度密切相關。唐、元時期景教，也里可溫在華的傳佈，尤其是其譯經釋經活動，均有中國知識階層

參與。由於這兩次傳播時間較短，範圍較小，故與中國知識界之關係不甚明顯。但明末清初耶穌會等天主教傳教修會的入華傳教事業，則與中國知識階層的關係既密切又複雜，這從明末清初士大夫對基督教的多種態度就可得知。

明清之際，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態度大體包括如下三種類型：第一種即由認同而皈依基督教。這些知識分子認為基督教與自己傳統的精神理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相吻合，二者可以兼容並蓄、殊途同歸。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王徵等著名士大夫都對基督教持「深慕篤信」之態，認為因此而「真得性命之學」、「定了生死大事」。然而，這些知識分子認信基督教的前提，乃看到基督教在華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徐光啟：《辨學章疏》），他們追求的是「耶儒相通」，因而只是一種融合性的認信，並沒有放棄其傳統思想文化精神。此外，他們皈依基督教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被傳教士本人的學問、人品所折服，稱其「實皆聖賢之徒」。例如，徐光啟為傳教士辯護時就曾突顯傳教士「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徐光啟：《辨學章疏》），所以在傳教士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感染下，他毅然走向信仰之途，在當時頗為排外、突出華夏中心的文化氛圍中另闢新徑、道出新聲。

第二種即理解和讚賞基督教思想文化體系，但仍強調中國文化之優點和包容性。這些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及隨之傳入的西學頗有好感，但多持「西學中源」之見，認為基督教中那些很有價值的思想因素和知識框架，在中國古代文化傳統裡早已存在，其本真可謂「傳自東方」、「流入西域」，現在則以基督信仰的形式，重新傳回已消失於歷史之流的中國本土。持這種態度的中國知識分子多在基督教與中國思想文化之間求同求通，追求二者的吻合與統一，但他們的出發點、立場則與持第一種態度的中國知識分子迥異。

第三種態度即對基督教堅決抵制和排斥。這些知識分子堅持中國道統純正、優先，不容外來因素對之構成任何威脅，因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頗具影響力的文化保守主義和自我封閉之態。

由上可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態度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其肯定者乃希望基督教能「補儒易佛」，為中國文化發展注入新的因素和活力；其否定者則感覺到基督教對中華文明，尤其是傳統思想文化體系構成威脅和撞擊，害怕由此會出現「毀我儒家，亂我中國」之結果。頗值得玩味的是，這兩類知識分子雖然在認知上對基督教持截然不同的態度，但二者的出發點和價值尺度卻有著基本的共通點：這兩類知識分子都體現出「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對國家、民族的命運與發展抱有深重的責任感，並且信守、維護正統思想體系之神聖和權威；其價值標尺亦根源於自身文化傳統，即看基督教思想體系是否符合或能完善中國儒家道統。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理解及態度明顯增加了政治傾向和民族情感，其中可以察覺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難心態。西方列強靠武力優勢硬闖入中國，造成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意識形態和精神價值的離異和抵觸，而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軟弱和對西方文化攻勢束手無策，則使這些知識分子對傳統感到失望和淡漠。這樣，「反帝」與「反封」、「啟蒙」與「救亡」遂成為這些知識分子的雙重任務。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知識界一方面熱衷於將西方的「賽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引入中國，以發起中國的啟蒙運動，另一方面則以對傳統的尖銳批評之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不再具有明清知識分子對儒家道統的眷念。不少知識分子在「反帝」心態驅動下，把「反洋教」作為其重要內容，基督教的負面形象由此延續至今。與明清兩代不同的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再以儒家正統和「夷夏之防」等狹隘民族主義為武器批評基督教，而主要以從西方引進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實證主義、實用主義哲學理論，以及西方近代發展中出現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來否定從西方傳入的基督教。這種「以夷治夷」的策略，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文化心態和價值取向上的一種潛移默化、意味深長的轉變。中國傳統價值體系在現代思潮衝擊下被動、無能的現實，迫使中國知識界以從西方引入的科學實證思想作為判斷一切的標準，並以反傳統意向來懷疑、否定中西傳統中的文化結構、道德規範和宗教信仰。這種意向與中國近代知識界重哲學、輕宗教的傾



向結合，使整個中國現代知識階層和社會主流在理解宗教時出現了偏差和失誤，而被貼有「洋教」標籤的基督教則首當其衝，受到種種非難和指摘。

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上理解和對待基督教的取向，仍影響著當代人的思路。不過，當代世界已是一個開放、多元、信息靈通的世界，人們的接觸、對話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是過去無法相比的。因此，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承受上述精神遺產的同時，也靠自我的多層面認知，而更廣泛接觸、深入了解基督教，從中得到許多與歷史經驗不同的新體會、新見地，這與中國知識分子和基督教本身的發展變化亦相輔相成、互為呼應。總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體認和表態也是多元化和多層化的立體圖景。

部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仍無法擺脫以國家興亡、民族命運的視角來理解基督教。這種「興國興民」的想法使他們對基督教作出政治或文化層面的判斷，其中可概括出三種傾向：第一種傾向乃以往對基督教抵制之態的延續。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已改善了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而基督教乃「西方文化侵略工具」的帽子亦被摘掉，但由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迄今未獲根本改善，如意識形態的分歧、政治的對立、「人權」等觀念的不同，以及經濟交往的磨擦等，都直接或間接地使中國人對基督教的認識增添了障礙。有些中國知識分子仍把基督教作為西方的政治文化依據、社會價值標準、精神載體或政治勢力而拒之。例如在文化層面上，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從亨廷頓 (Sam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上得到啟發和提醒，把基督教視為將與中國文明發生衝突的未來對手，故此他們轉向儒家傳統，寄希望於新儒家的「新三次高潮」和所謂「國學復興」，以一種自我保護、防患於未然的心態來看待、抵制基督教文明。

第二種傾向為兼容基督教或與基督教結合。一些當代知識分子在打開國門看世界之後，敏銳地感受到中西國力之間的差距、中國自身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的滯後。他們正是在這種強烈反差和刺激中重新認識基督教，也看到基督教作為文化積澱、價值規範、倫理準則、社會公義在

西方國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從而抱著「拿來主義」的態度來了解、認識、介紹基督教精神體系和文化意義，試圖將之與中國文化因素相結合，重建和振興中華文明，使中國文化發展走出低谷，重新成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組成因素。因此，這些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個人的認信、皈依等不感興趣，對教會組織的發展和教徒人數的增加等亦不大關心。他們所強調的乃是文化意義上的溝通、對話、互補和契合，注重注入基督教精神後所創造的全新文化氛圍及對中國人「素質」的提高。

第三種傾向則是信仰基督教，將之看作拯救中國或拯救個人的根本之途。這些知識分子一般已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現實價值體系感到失望、甚至絕望，繼而折服於基督教信仰及其價值體系。這種稱為「走向十架上之真」的追求在當代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比重並不很大，對社會也沒有產生明顯影響。究其原因，乃是這些傾心、皈依基督教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或由於對中國的現狀、既存的文化氣氛感到失望隔膜而遠走他國，定居西方；或是以港澳固有的基督教社會氛圍為依托，在大陸、港澳台的邊線上尋求突破。他們的共通點乃是放棄，或者說失去了在中國大陸本有之「根」，以一種旁觀者輕鬆、解脫的態度來表現其對中國文化的「第三種忠誠」。但對大多數並無這種「特殊身分」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而言，這些認信者並不能作出一種榜樣的見證，甚至缺乏明清間耶穌會入華傳教士的那種人格魅力，這難怪人們會對基督教產生隔膜、陌路之感。對於身臨其境、依附其根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是要在現實生活、共有的社會氛圍中見證那體現基督教本真、且為中國文化知識界所缺乏的謙卑精神、拯救精神，勇於參與基督受難及甘當僕人的精神。人們需要的不是旁觀和評議，而是參與和服務；人們需要的不是游離在外的指摘或說教，而是親臨其境的表率 and 榜樣。中國知識人希望每個理想意義上的基督徒都能夠體現上述的基督精神。借用佛教術語來說，若僅有旁觀者的輕鬆、灑脫和滿足於「個我得救」的歡悅，這僅是「小乘」境界而已。現在缺乏的乃「捨我」而救世，即以「僕人」之態去服務，而不是以「先知」之姿來君臨；以犧牲「小我」的得救來換取眾人的幸福和民族的希望，這才是「大乘」之境。

去年12月香港「社會變革與教會回應」會議上，曾有人談起香港基督徒對「九七」香港回歸中國之「怕」，這使筆者生出某種惆悵和失望。對於基督徒的「去」與「留」，波蘭作家顯克微支在其名著《你往何處去》中曾以基督的勸告和彼得的選擇給人啟迪，儘管今天的處境決不可與彼得之時同日而喻。基督徒之所以「生活在這一世界」而「不屬於這一世界」，乃是其生活的「質量」應與眾不同，有「做鹽做光」之見證。因此，我們或許能在那種真正的「留」——不是拿著外國公民權，隨時抽身可走之「留」——上看到基督徒的「質量」、「見證」和給中國的「希望」。記得在1994年美國「北美傳教士對中國的影響」會議上，筆者曾與鄧肇明先生爭論。他曾對中國知識分子感到失望，說一遇風波和「教難」，知識分子就不見了，為此向筆者問道「知識分子在哪裡？」那麼在中國大陸知識界重新認識、反省其對基督教之態度的今天，筆者也想深深發問「基督徒在哪裡？」可見第二和第三種傾向目前尚未達到理想的交匯和契合點，而第三種傾向則因多數信仰者出現定位偏差，所以存在與大陸知識界構成誤解或隔膜的潛在危險。以上種種使人感到今日基督教在華的希望之路仍極為曲折和艱難。在目前這種處境中，我們所能渴求的，乃是相互理解、多加溝通、共建美好未來，而不是在過去的誤解、陰影中猶豫、徘徊或退縮。

綜上所述，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理解和態度是多元的、變化的和發展的，我們已不能對之作籠統化或靜止化的解釋。基督教的歷史與現實，基督教作為精神力量，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是立體的、多棱的、複雜的。因此，我們正面對一個開放的世界，面對一個開放的未來。至於中國知識界與基督教將來究竟能構成一種甚麼樣的關係，則要靠雙方的生活見證和真誠努力；而基督教在中國的希望、在中國文化發展的希望，亦與此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

## 撮要

本文分析、研究了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的關係及對基督教的態度，指出中國知識分子體認基督教一是考慮民族、國家及文化精神發展的大局，二是受到

信仰承載者之人格感染。全文在第一部分敘述了中國大陸知識界研究基督教的五種原因，包括對人類文明史、世界文化史的興趣；關注西方的精神思想；重新認識基督教在華的歷史；體認尋真的靈性；以及對學術拓展的基本考慮等；第二部分則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三種頗為不同的態度：即批評而抵制；兼容而結合；或認同而皈依。文章最後提出了基督教在華的形象及意義問題，指明中國知識界與基督教之關係乃靠雙方的生活見證和真誠努力。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hristianity, and the attitud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ward Christianit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b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s based firstly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nation's soci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secondly on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of Christian believer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five interests or reasons in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by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Chinese mainland, including their entire interest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ir special concern for the Western thought and spirit, their reeval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ir spiritual experience of the Christian way in seeking truth, and their consideration in developing academic research. The second part analyses thre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Christianity b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amely from criticism to resistance, from compatibility to combination, or from identification to conversion. Finally the paper raises the question of the form and the meaning of Christian existence in China and shows clearly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hristianity depends upon the life testimony and efforts from both sides.